

论现代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

日益成为世界性进程的现代经济增长所提出的本质要求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从而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就成为每一个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的深层、宏大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世界性的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客观必然性，深刻理解各国政府把产业结构优化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之一的实质。因此，本文试图把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置于更高、更广的视角，即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来考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

一、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与本质

所谓现代经济增长是特指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中叶的西欧，继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过程。以按常规测量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组成、人口、劳动力等等为基础所作的分析，已经发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1）按人口计算的人均产量的高增长率和人口的高增长率；（2）生产率（包括所有生产要素单位投入量的产出率）的高增长速度；（3）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其主要方面包括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工作，以及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生产单位的生产规模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内供应和国外供应的相对比例的变化等；（4）与经济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且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也改变得非常迅速；（5）经济发达国家借助不断增强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运输和通讯方面，具有向世界其他地方伸展的趋向，从而使世界经济一体化；（6）尽管现代经济增长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中的传播还是有限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的潜力可能达到的最低水平。

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这六个特征支持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即现代经济增长标志着一个特定的经济时代。^①如果我们把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特殊经济时代来考察，那么就会发现在上述种种特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总量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高变动率。统计分析表明：

（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大约一个世纪内（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80年代），15至18个目前发达国家中，人口差不多增长3倍，人均产值却增长5倍多，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增长15倍，有的国家甚至增长30—50倍。然而，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在1000年至1750年几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中，欧洲的人口是按每世纪17%的比率累进增长，人均产值每世纪的增长倍数在1.25至1.50的范围内变动，或者说不到现代时期增长倍数的四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②

(2) 经济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相对比重的迅速消长。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来看,在一个世纪里,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从40%以上下降到10%以下;工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则从22—25%上升到40—50%;服务部门的产值份额也有上升。如果从劳动力的部门份额变动来看,结构变动更为明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在一个多世纪内下降了35—50%。^③

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真正对此关系首先作出经验性总结的是英国经济学家C·G·克拉克。他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转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其对国民经济统计分析的擅长,改进了研究方法。其主要是:第一,不仅从劳动力结构,而且从部门产值结构方面,研究了与总量增长的关系。第二,不限于对观察值的利用,而且对历史数据和截面数据进行了统计回归,得到了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相应份额的某些合理而有用的“基准点价值”,从而使验证更富有一般性意义。第三,不仅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与总量增长的一般联系,而且分析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库兹涅茨运用经过改善的研究方法,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处理,分别作了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低组距内(70至3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下降显著,非农业部门的份额则相应地大幅度上升,但其内部(工业与服务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动不大。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高水平组距内(300至1000美元的基准点价值之间),农业部门的份额与非农部门份额之间变动不大,但非农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则较为显著。^④显然,库兹涅茨把现代经济的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内在关系揭示得更为深刻和具体。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现代经济发展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联系,霍斯·钱纳里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更大信息量的最新研究。他认为,一个沿着更加现代化的增长模式演进的经济增长的普遍模式的存在,可能仅仅是由于产业体系有着某种在世界范围内趋同的要素。^⑤为此,他首先确定了分析的基本假定前提:(1)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者需求的构成将发生变化;(2)资本积累以超过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增长;(3)技术进步对各国都是普遍的;(4)存在着可利用的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通道。根据这些假定,他从大量观察值中选择了10个基本经济过程来描述几乎所有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并用27个变量规定了这10个经济过程。然后将收入水平和人口数作为外生变量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一致的统计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的“发展模式”。为了使分析的结果更广泛地运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回归方程对“发展模式”复合、回归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根据“标准结构”的描述性结论,总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GNP100至1000美元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都将发生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可见,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它可以对结构变化过程中大量相互关联的资源转移和分配等各种类型作出连续的描述,并可以以此来识别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

总之,经济学家已经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确认了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结构成长的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总量的高增长率与结构的高变动率无疑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基本特征。

然而，问题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更为深刻、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果说人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没有多大异议的话，那么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本质的看法则有较大的分歧。

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对此进行的争论，反映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缺乏所需要的总量变化就严重地限制了内含的部门变化的可能性。^⑥

根据库兹涅茨的看法，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因为只是总量的高增长率才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没有总量的足够变化就会严重限制结构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具体说明：

（1）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动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换。然而，消费者需求结构是对各类商品供给的丰富水平具有不同的反应为其特征的。如果消费者需求结构对保证消费品增加供给的不同制度条件是持续的、并大体不变的，那么按人口平均产值的增长率越高，消费者需求结构的改变也就越大。^⑦因此，逻辑的顺序似乎是：总量高增长率引起需求结构高转移率；需求结构高转移率拉动生产结构高变动率。

（2）某个部门有了重要的技术革新突破以及技术革新的中心发生转移，将对生产结构产生直接影响。然而，一项有重大经济影响的技术革新是三个方面的综合：①一项发明，它提供了一种骨架，使一系列次要的发明和改进能环绕它而建立起来；②物质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供给；③巨大的潜在需求，它经常通过当前增长快的工业在生产进程中的明显的薄弱环节透露出来。这三个组成部分是互为制约的，而同时又都与总量增长有密切关系。另外，技术革新中心的转移则是需求偏重某种产品选择性的结果。因此，技术革新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动仍然是处在总量框架之内的。

（3）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反映各国间产品生产相对优势变动的各国进出口结构的不断变动，也会促使一国国内生产结构的改变。然而，产品生产相对优势的变动，则说明本国较世界其他国家拥有较高的增长率。因此，通常作为技术进步高速度发展反映的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就会有助于相对优势的迅速改变，从而也会加强国内生产结构的改变。^⑧

与库兹涅茨的观点截然相反，罗斯托认为，近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角度加以研究。^⑨当然，罗斯托本人无意要否定总量概念，而只是强调离开了部门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罗斯托主要是从创新以及主导部门的角度论证其观点的。

（1）新技术的吸收本来就是一个部门的过程。罗斯托认为，技术创新是具体的，它总是与某一特定部门中的经济问题相联系的，也会遇到这个部门在制度上和社会上的所有问题。因此，技术创新能否出现和是否行之有效，是由特定部门中广泛的关系及其特点决定的。

（2）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创新于某个部门之中，是一个与其他部门以及是整个经济的运转相联系的纵横交错的复杂过程。应该说，罗斯托所指出的这一点，正是库兹涅茨、钱纳里等采取的典型的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法的缺陷之一。

（3）经济增长是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罗斯托认为，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变的强有力的、核心的引擎。因为这些具有新的生产函数的主导部门会发出各种扩散效应，从而使经济增长产生飞跃。在此过程中，当旧的主导部门衰退时，新的

主导部门便会诞生。因此，“增长的完整序列就不再仅仅是总量的运动了；它成了在一连串的部门中高潮的继起并依次关联于主导部门的序列，而这也标志着现代经济史的历程”。^⑩

这场尚未充分展开的争论，就其本身性质来说，只是限定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分析描述的范围内。库兹涅茨的观点实质上是在总量增长的框架内，把结构变动描述为一种渐进的、连续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涓流效应使动态结构趋于稳定与均衡。罗斯托的观点实质上是动态结构的非均衡变动为基础，把总量增长描述为一种自我持续的持续增长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回波效应使总量增长不断加速。

但是，这场争论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因为，它不仅仅是采取总量分析，还是结构分析来描述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问题，从这一争论中可以引伸出一个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践性问题，而这对于刚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

二、现代经济增长的主题：结构调整

库兹涅茨和罗斯托的争论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使我们得以沿着这一线索寻找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历史性逻辑。这也许是库兹涅茨和罗斯托都不曾料想到的。

我们认为，增长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总量概念，它表明人均产出有规则地上升。但是，现代经济增长已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我们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和怎么发生的，因而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问题。当然，结构与总量是不分割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相对地位的区别和给予不同的权重。

从基本倾向来说，我们赞成罗斯托的看法，并也同意他对这一问题的个别论证。但我们认为罗斯托的论证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应给予补充。

(1) 现代经济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部门增多，行业间的交易变得相当复杂，相互之间的依赖强度增大。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曾根据经过整理的实际数据，设计了两个经济结构（欠发达和较发达）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比较发现，在较发达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中，部门交易上的中间产品种类增多，其交易规模增大，充分显示了现代经济增长更具有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倾向。^⑪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效益就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这种来自结构的经济效益，其意义远远超过个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效益。如果说劳动生产率提高这种经济效益是所有经济增长都具有的话，那么结构效益则是现代经济增长享有的“专利”。

(2) 现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持续高增长。一般说来，持续高增长取决于资源的动员及其有效配置，而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果。如果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与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相适应，与技术的发展相适应，则资源配置是有效的，能保证总量的持续增长。如果产业结构扭曲，则会严重降低资源配置的效果，即使短期的高增长也许可能。但最终会因结构制约而不能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国际经验表明，结构扭曲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从一般趋势来说，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产业结构将不断向高度化演进，但总量增长并不会自动形成结构合理和带动结构成长。因此，逻辑的顺序应该是改革结构，促进结构合理化，以此推动持续高增长。

(3) 现代经济增长的又一个明显变化是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可以说，现代经济中生产率的高增长率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最终可归因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新的科学技术不可能在所有现存的生产部门之间平均分布，

它只被特定的生产部门所吸收，因而技术创新总是首先在某个特定部门出现而后再向别的部门扩展。可见，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是通过结构关联效应实现的。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新作用不断扩散，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不断转移。显然，在产业结构扭曲的情况下，结构关联将发生断裂，从而使技术创新扩散受阻。

如果说上述这些理论分析仅仅是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的理论假说，那么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的发展过程却使这一假说得到了历史验证。

这些国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准备阶段；高速增长阶段；稳定增长阶段。

（一）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一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或略高于300美元（1958年美元），与此相联系，尚未能稳定地形成较高的积累率，从而基本上没有形成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具有出口竞争能力的主导产业。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处于以落后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向工业化结构转变时期，主要有以下特征：（1）第一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比重（30—40%）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比重很大（70—80%），但这些比重逐渐降低。（2）第二次产业处于成长期，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处在建立与成长中，增长较快。（3）传统农业与现代非农业、落后农村与先进城市、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之间的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显著。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初步工业化，使国民收入中工业所占比重超过农业，并初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粗放式的外延扩大再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因而这时期社会供给总量往往短缺，总量矛盾往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二）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以上，一般在300—2000美元区间。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主要特征是：（1）第二次产业高速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最大比重，第一次产业比重迅速下降，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2）形成了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加工度与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技术知识密集产业和新兴产业所占的比重增大。（3）第二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加快，处于结构高度变换时期。重化工业一般占较大比重。（4）二元结构出现重大转化，现代非农业已占主要地位。

在这一阶段，结构矛盾经常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为当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这一阶段水平，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以温饱满足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向非必需品消费阶段转化），原有的产业结构对需求的迅速变化已难以适应，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正是这一要求才形成这一阶段产业结构迅速转换的特征，也只有经过这种结构迅速转换才能推动高速增长，并进入一个高增长—→高国民收入—→高积累—→高投资—→高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稳定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3000美元以上，消费进入“高额消费阶段”，与此同时，产业结构逐步具有“后工业化”的特征：（1）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甚至超过第二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的增长相对减缓。（2）在第二次产业内部，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比重逐渐下降，技术知识密集的产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并且反映当代科技进步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3）二元结构基本消失，农业已实现现代化，农村已改变落后面貌，传统技术基本上被现代先进技术所取代。

在这一阶段，结构矛盾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为不少产业已经历了几十年的

发展，规模经济的效应已达极限，生产的迅速扩张开始受到市场空间的阻碍，它们正在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其增长开始逐步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实行结构转换，不仅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且总量增长也将缺乏推动力。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狭义的现代经济增长（仅包括高速增长阶段和稳定增长阶段）的历史过程来看，显然结构矛盾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从而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即使从广义的现代经济增长（还包括准备阶段）的历史过程来看，虽然在准备时期总量矛盾较为突出，但在整个过程中它仅占极小的地位，基本的方面仍然是结构问题。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也充分验证了其本质是结构问题。

确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现代经济增长本质要求是什么？既然其本质是结构问题，那么要获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持续性，首要的问题就不是增加投资、增加就业以扩大经济规模，而是产业结构调整，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合乎规律的转换中求速度、求效益。显然，要从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中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具备适时适宜地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能力（即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各国的盛衰荣辱，决定着各国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其奥秘就在于其具有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而曾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经济的“黑暗”时代。

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它对于所有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国家都是适用的。对于先进入这一进程现已成为发达经济的国家来说，一些传统的重工业正在迅速衰落，高技术产业正在兴起，它们正面临着“后工业化”阶段的结构转变。如果它们不采取有效的产业政策，增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稳定的经济增长将难以维持。为此，一些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疾声呼吁：排除增长道路上的结构性障碍。对于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正处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需求结构急剧变动从而要求产业结构有较大调整的阶段。为了实现经济起飞，并赶超先进国家，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势在必行。

总之，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要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采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至于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是否有效，则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正确地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取决于运行机制、经济环境和体制是否适应和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正确实施，取决于产业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是否协调等因素。然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要进一步详细展开探讨的。

①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第23页。

②③④⑦⑧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323、330、118、345、346页。

⑤参阅《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9页。

⑥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⑨⑩同上书，序与跋第5、7页。

⑪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合著《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